

老在天一涯



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

叶嘉莹 白先勇 等口述
李怀宇 采写

中华书局

各在天一涯

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

叶嘉莹 白先勇 等口述
李怀宇 采写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叶嘉莹,白先勇等口述;李怀宇采写. —北京:中华书局,2016.3

ISBN 978-7-101-11314-3

I.各… II.①叶…②白…③李… III.名人-访谈录-世界-现代 IV.K8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084 号

书 名 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

口 述 者 叶嘉莹 白先勇 等

采 写 者 李怀宇

书名题签 余英时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徐麟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4 $\frac{3}{4}$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314-3

定 价 56.00 元

序

在我的访问生涯中，有几次经历颇为特别：2007年赴美国，2009年赴台湾，2011年赴新加坡，都有忘不了的人和事。回首十年，我心仪的华人，多有缘面见。借助现代科技，似乎已不复万水千山的距离。偶翻古诗“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20世纪的中国，忽值山河改，华人在世界各地谱就动人的乐章。我有幸在21世纪踏上寻访华人心史的旅程，仿佛对“中国情怀”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当年艾儒略所谓“无处非中”，何尝不可另解为“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就我的亲历所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往往在旅居海外的华人身上自然地流露。而沐浴欧风美雨的现代文明，与汉魂唐魄可以兼容。

我十九岁时才第一次出远门到省城念书，而今已过了十九年。人间的离乱与家国的变幻，使我难免困惑。访问知识人，既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兴趣，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为我自己解惑。白居易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

抵心安即是家。”跋山涉水后重读，更有共鸣。当见识人情冷暖时，我不禁神游万里，在温情与理解中找到一些心安的理由。

早岁不知世事艰，总是心怀梦想。我常常梦想有一个美丽的心灵家园，可惜在尘世间不时为人性的种种幽暗所缠绕。我也常常憧憬盛世，奈何要深入研习现代文明，才能在现世的无力中勇往直前。长远而言，我依然乐观。走过的地方越广，访问的人物越多，我越充满信心。在与海外知识人的谈话里，我相信华人社会在现代文明的普照下，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进步，梦想并不遥远。

李怀宇序于悠然居

2015年2月

目 录

- 叶嘉莹：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1
- 林文月：翻译家应该站在原著与读者中间 /25
-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文明” /41
- 白先勇：重寻历史真相 /57
- 王赓武：关注华人的忧患与命运 /75
- 郑永年：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实验室 /103
- 陈瑞献：追寻文艺复兴人 /125
- 杜南发：大家要放在历史长河中考量 /165
- 王润华：文学要越界跨国 /205
- 陈家毅：我怀念南洋悠游自在的情调 /225
- 王汎森：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 /243

唐翼明：探求中国精神史上最繁荣自由的时代 /259

陈冠中：用小说来写世纪的大戏 /303

石元康：在现代化进程中反思中国文化 /331

张学明：神话里的英雄也抗拒不了命运 /351

苏基朗：国史上有惊人相似的繁荣发展之路 /373

黄君实：字画要讲究文化修养 /391

傅 申：艺术品会自己说话 /413

刘绍铭：学问多在教室以外 /437

鲍耀明：一言难尽历史人物 /451



叶嘉莹

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叶嘉莹

1924年生，北京人。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上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赴美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著有《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诗词稿》等。

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往往难忘其风采。在叶嘉莹家里听她谈话，感觉如同听课。每讲到一个精微的学术问题，叶嘉莹会不厌其烦地分析，古典诗词与西方理论并用，配上独一无二的吟唱声调。此时外界的一切似乎不复存在，仿佛进入了人与诗词合一的境界。

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在经历了忧苦不幸之后，叶嘉莹对这两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她自述：人生中第一次打击是1941年母亲逝世，父亲远在后方没有音信，她在沦陷区要照顾两个弟弟；第二次打击是1949年丈夫在台湾被拘捕，次年她也被拘捕，独自带着出世不久的长女言言度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第三次打击是1976年，结婚不满三年的长女言言与其丈夫宗永廷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车祸，夫妻同时罹难。叶嘉莹结合个人生活的实践来叙述学诗与学道的方法，让人更觉可亲可信：“中国的古文真的是有一种修养，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不管物质的生活多么困苦，感情多少挫折，我有一份定力，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感谢小的时候第一本开蒙的书《论语》，它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沦陷区生活艰苦，但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经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叶嘉莹先在中学任教，后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起，叶嘉莹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学，其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深具影响。

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源于对中国文学的爱。她笑道：“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而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们幸而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代，我们也很不幸地遭遇到这种离乱的痛苦。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我也幸而活得这么长久，幸而具有一个古老的

旧家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是偶然。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而对如今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话，就不是一件好事。‘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你的名声超过你的现实，你应该羞耻。”

李怀宇：1941年为什么去读辅仁大学国文系？

叶嘉莹：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了，所有过去所谓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本来还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但因为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本宣战，所以燕京大学也关门了。当时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制的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了，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那时不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日本对我们这个有德国、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学校就比较宽松，我们没有受到日本的管制。

李怀宇：当时辅仁大学师生的生活受到时局的影响大吗？

叶嘉莹：当时是这种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研究目录学的，我们的戏曲史是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教的，诗的课原是储

皖峰教的。教文字学的本来是沈兼士，后来离开了，他到后方去了。当时中国抗战有四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正经的粮食可以吃，不但好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就连玉米面、小米面都没有。我们只能吃日本配给的混合面，混合面根本谈不上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颜色，一点黏性都没有，不用说包饺子不成，切面条不成，连烙饼也会散开。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烧开的水里煮碎，变成一块一块的，很酸很臭很难吃，我们就用炸酱，很咸的炸酱，把它拌下去吃，所以营养不好。储皖峰先生因此就得了脚气病，本来是每周上课来一次，我看见他上讲台都很艰难，而不久储皖峰先生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因为燕京大学关门了，所以原来在燕京大学担任诗选课的顾随先生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唐宋诗了。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到后方去的老师很多，也有的去了半路被拦截回来的。顾先生因为有六个女儿，小女儿还很小，当时在念小学，所以就留在了沦陷区，我们很幸运地受到顾先生的教育。当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词选的老师——孙蜀丞先生，所以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其实没有开过词，他开的就是唐宋诗。

李怀宇：顾先生上课的风度是什么样的？

叶嘉莹：当时顾先生大概五十岁左右，但是他身体不大好，所以看起来比他真实的年龄要大一点。我有他的一张相片，头发已经花白了，平头，没有留发，很清癯。他总是穿长袍，从来没看见穿西装，冬天的时候里面穿棉袍，外面穿皮袍。因为学校离他那儿不远，他经常是走路

来上课的。顾先生讲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纯粹是自己的感发。冬天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皮袍脱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后也不讲话，转回头就在黑板上写很多字，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讲的那篇古诗，有的时候也写他近来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这个话题讲明，一直推衍升华，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我一直保存着顾先生的讲课笔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顾先生讲课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出自我那十几本笔记。最初我给了顾之京（顾随之女）整理的是八本，后来我又给了她几本，大概有十二本，都是我当年听课的笔记，也不仅是唐宋诗一门课。

李怀宇：孙蜀丞先生和顾随先生讲词有什么不同之处？

叶嘉莹：虽然孙蜀丞先生也讲词，但和顾先生的讲词派别不大一样。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早年在台湾大学开的课是诗，不是词，而且一直在台大没有教词，我是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以后才开词的课。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比较明显，它的内容、思想、好处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说明；可是词呢，因为早期的敦煌词没有流行，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词集就是《花间集》，《花间集》里都是供歌唱的小词，所以早期填词的人认为小词就是艳曲，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早期的词学就是从困惑之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词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都是游戏笔墨。

可是我为什么对词有兴趣呢？因为词非常微妙，它的好处正是在于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的观念，不像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它是游戏笔墨，写词时不带有面具，反而把内心里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但是本质流露是我现在这样说，早期的词学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小词一直到陆放翁的时代还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所以就写一点小词，都是没有价值的，应该烧掉的，不过我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后来慢慢就觉得小词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没有意义和价值，可是里边好像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受丰富的一些东西。这很难认识，大家恍恍惚惚很难说个明白，所以都是三言两语的，不成系统，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论文，都是序跋，像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像刘克庄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之类，都是偶然说到的，不是正式的。真正把这个提出来的还是张惠言。张惠言编有一本词选，不是针对一个人的，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归纳出词有一种特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诗与文的传统之中，在批评术语里边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词不是比兴，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词很奇妙地在它的隐意识里、在游戏笔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本质。大家都说不明白，张惠言有个办法，就说这大概就是诗的比兴，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张惠言的说法刚一出来，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都认为他牵强比附。可是经过的时间越来越久，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得对，词里面是真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种言外的意蕴。

孙蜀丞老师就是从这一派沿袭下来的，所以他开始给我们讲晚唐五代的小词，就说这里边有什么托意，那里边有什么托意，可是他没有像我刚才这么谈源流，张惠言说这大概有比兴寄托的意思：冯延巳有托意，欧阳修有托意，苏东坡也有托意。我从小学的时候学词——我自己读词，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就很喜欢词——我找一些关于词学、词论的书来看，但对古代的词学一直在困惑之中，觉得它说也说不清楚，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说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头绪。当时我年轻，还没有入门呢，可是我遇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就觉得王国维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让我有共鸣。王国维不是套在一些理论之中，他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这个我有体会，所以我觉得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可是王国维说张惠言说的比附是牵强附会，反对他。顾先生是王国维这一派下来的，是直接的感发，不喜欢牵强附会。所以，我听了孙蜀丞老师的说法，觉得与我小时候对王国维的感受都不相合，所以我当时对于孙蜀丞先生的说法不是很能接受。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孙先生讲的是词的正式的传统，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明，而我这几十年所努力的就是把大家不明白的给它说明。张惠言的说法看起来像是牵强比附，作者实在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就是要用我体会到的给它加以说明，我认为小词之所以让读者产生这种种的联想，就是清朝后来的人说的：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读者可以有此想！我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孙蜀丞老师是传统一派，可是他也被传统拘束了，他一定要说这个是比较

兴寄托，那个是比兴寄托，他是感觉到张惠言的说法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解开这个套子。顾随先生觉得张惠言太偏狭了，太死板了，太偏执了，所以顾随先生就跟王国维一样，摆脱张惠言，不要他的，就依靠直接的感发来说了。我是受这两位老师的教导，一个是这一派的，一个是那一派的，其实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模糊影响之中，还没有能够说明。

李怀宇：你从南京去台湾后，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造成的压力有多大？

叶嘉莹：压力很大，因为那时候南京陷落，蒋介石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如果不是美国干预，共产党可能就把台湾拿过来了，所以他很害怕。而且，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其实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很向往的，因为国民政府贪污腐败，这个大家早就认识了，说在抗战的时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光复后就说“五子登科”，就是房子、银子、金子什么东西吧，所以很多人对国民政府很失望，很多人向往这边的政府，台湾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解放了，是不是？他就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他就给你扣一顶帽子！台湾大学很多学生被抓了，我们社会上的公教人员也有很多被抓的，不但我的先生被抓了，很多人都被抓了。

李怀宇：先是你的先生被抓了，然后是你也被抓了？

叶嘉莹：我比他晚一点，我们是1948年春天结婚，1949年夏天生了我的第一个女儿，1949年我的女儿四个月的时候，我的先生被抓了，第二年6月我的女儿还没满周岁